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解读丛书

Makexi Zhuyi Jingdian Zhuzuo Jiedu Congshu

主编/王为全



马克思主义的知行观

《实践论》

解 读

孙旭◎编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解读丛书

Makesi Zhuyi Jingdian Zhuzuo Jiedu Congshu

主编 / 王为全



马克思主义的知行观

《实践论》

解 读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的知行观：《实践论》解读 / 孙旭编著. —北京：现代出版社, 2016. 1

ISBN 978 - 7 - 5143 - 1659 - 9

I. ①马… II. ①孙… III. ①《实践论》- 毛泽东著作 - 研究
IV. ①A841. 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71977 号

作 者 孙 旭

责任编辑 王敬一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 - 64267325 64245264(传真)

网 址 www. 1980xd. com

电子邮箱 xiandai@ cnpitc. com. cn

印 刷 三河市燕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2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43 - 1659 - 9

定 价 26. 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前 言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它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把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出了理论概括，进而形成的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实践论》是毛泽东写于中国革命战争年代（1937年7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那么，时隔半个多世纪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要重新解读《实践论》呢？

正确对待认识与实践的关系。我们的感官，在观察自然现象时还能够坚持唯物主义的观点，但当我们观察人类社会形形色色的复杂现象时，则深深地陷入了“唯心主义”。客观实际本身不会开口说话，对人们的认识是否正确不能直接作出回答。所以，要想活得“明白”，就必须抓住事物的本质。只有抓住事物的本质，才能按照事物本身的客观规律办事，才能办好事。实际上，这就是关于知和行、以及如何处理好知和行的关系问题。大到党和国家制定大政方针，小到个人履行实践，无论是谁，都必须直面这个问题。《实践论》就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中国的情况，解决这个问题的经典作品。

方便我们直接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曾说：“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系统深入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去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各种极其复杂和重大问题，不断地给人们指出走向胜利的道路。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继承和发展，它集中表现在毛泽东的一系列哲学著作中，《实践论》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作。可以说，通过学习毛泽东的这部哲学著作，我们能够直接领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关于实践的理论、认识的理论以及认识与实践相统一的理论。

领会“实事求是”的哲学思想。历史的实践证明，“实事求是”是帮助人们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有力武器。而《实践论》恰恰是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直接来源。可以说，从多大程度上掌握了“实事求是”思想，就从多大程度上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深入地、系统地学习《实践论》，对于提高我们的理论水平，提高我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是有很大帮助的。虽然《实践论》成书于七十多年前，但无论昨天、今天、明天，它依然是一部能够指导我们改造自己思想、改造外部世界的伟大哲学著作。

最后，在学习《实践论》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能学到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和实践的一般原理，还能从中感受到毛泽东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编者

2014年1月23日

目 录

第一章 《实践论》孕育成书的必要条件	1
第一节 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	1
(一) 总结革命成功的经验	1
(二) 反省革命曲折的教训	5
第二节 毛泽东的哲学准备	12
(一) 早年的哲学积累	13
(二)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求索	14
第三节 湖湘学风的传承	17
(一) 湖湘文化的巨大魅力	18
(二) 湖湘学风对于毛泽东的影响	22
第二章 精读《实践论》中的实践理论	27
第一节 全面理解实践的含义	27
(一) 实践的三种特征	28
(二) 实践的三种表现	30
(三) 实践的三个环节	32
第二节 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	38
(一)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	39

（二）实践是认识发展的根本动力	43
（三）实践是认识的归宿	49
（四）如何检验真理性认识的正确与否	51

第三章 品读《实践论》中的认识理论

57

第一节 奇妙的认识能力

58

（一）认识的主体	58
（二）认识的客体	59
（三）认识的工具	61
（四）认识的能动性	62

第二节 深化认识要遵循规律

65

（一）先从实践到认识	68
（二）再从认识到实践	73
（三）认识发展的规律	83

第三节 触及真理

90

（一）什么是真理	91
（二）真理都是绝对的吗	103
（三）检验真理的标准	115

第四章 解读《实践论》中的认识与实践

相统一的思想

127

第一节 认识对实践有指导作用

127

（一）为什么要学习理论	128
（二）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	136

第二节 改造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

137

(一) 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说不	138
(二) 努力改造主客观世界	144
第三节 努力做到认识与实践的统一	151
 第五章 《实践论》的贡献与价值	153
第一节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力作	153
(一) 《实践论》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了中国话	153
(二) 《实践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	154
(三) 《实践论》是对旧有知行观的一场革命	156
第二节 《实践论》的历史贡献	166
(一) 《实践论》与延安整风运动	166
(二) 《实践论》推动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	168
第三节 《实践论》的当代价值	169
(一) 《实践论》为破除“两个凡是”提供理论依据 ...	169
(二) 《实践论》是党的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	171
(三) 《实践论》帮助我们解决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 ...	172
 名词解释	179

第一章 《实践论》孕育 成书的必要条件

《实践论》是一本光辉的哲学著作，它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尖锐的武器。我们要想了解《实践论》，就必须首先了解毛泽东以及他的思想来源，而要想了解毛泽东和他的思想，就不能不了解《实践论》的写作背景。

第一节 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

（一）总结革命成功的经验

《实践论》是党独立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成功经验的哲学总结。革命成功的经验告诉我们：一方面，只有正确认清革命的形势，才能开展成功的革命运动；另一方面，还要在革命运动的实践中总结经验、提高认识。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近代中国社会及人民革命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同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随着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出现，建立新型的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提上了日程。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派维经斯基等人来华。他们先后在北京、上海会见李大钊和陈独秀，讨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并帮助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的中心任务是讨论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大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规定党的纲领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联合第三国际。党的一大正确地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必要性、紧迫性，确认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的指南，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行动纲领。正是有了这样的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事业走向胜利。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1922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苏兆征的领导下，香港举行了海员大罢工。罢工从要求增加工资的经济斗争，发展成为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政治斗争。3月8日，历时56天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宣告胜利结束。

只有正确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形势，才能领导中国革命朝正确的方向前进。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共二大正确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和前途，指出了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

次提出了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现阶段的革命纲领即最低纲领是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在当时的特定背景下，各种流派学说林立，人们的思想混乱，无法真正看清当时中国的时局，更无法看清中国革命的未来前途。毫无疑问，中共二大为中国各民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正确方向，对中国革命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1922年10月23日，在邓中夏、彭礼和、王尽美、邓培等人的组织下，开滦五矿5万多名工人开始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帝总同盟罢工。正是因为有了共产党的领导，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才取得胜利。英国人无可奈何地说：今天的中国工人不象像昔时候，而是完全变了。1923年2月4日，在张国焘、项英、罗章龙、林育南等人的领导下，京汉铁路全路两万多工人举行大罢工，1200公里铁路顿时瘫痪，严重影响了帝国主义在华的利益。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恐慌。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吴佩孚调动两万多军警在京汉铁路沿线镇压罢工工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进一步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扩大了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

为了结束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增强新生的革命的力量，促进中国革命事业快速发展，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必须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进行合作。1923年，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党的三大召开，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思想、组织上的独立性。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形成了新三民主义，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第一次国共合作加快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

在革命运动的实践中总结经验、提高认识。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同年7月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了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在共产党力量较强、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湖南、湖北、江西、广东4个省举行秋收暴动，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8月1日，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唤醒广大中国人民，表明中国共产党要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立场，在周恩来、谭平山、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的组织下，中国共产党发起了南昌起义。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紧急召开“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和开展土地革命的总方针。毛泽东在会上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议决定派毛泽东去湖南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和领导秋收起义。9月9日，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湖南东部和江西西部的工农革命军举行了秋收起义。秋收起义为后来各地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大规模发展奠定了基础，并印证了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思想。9月29日，毛泽东在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领导了举世闻名的“三湾改编”，他创造性地确立了“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官兵平等”等一整套崭新的治军方略，三湾改编是中国共产党建设新型人民军队最早的一次成功探索和实践。

随着革命的深入，1931年11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雏形，是我们党建立人民政权的探索和尝试。为了摧毁中华苏维埃政权，国民

党组织了五次声势浩大的围剿行动。在第五次“反围剿”后，红军第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的主力决定开始长征。1934年10月上旬，中央红军主力各军团分别集结陆续出发并向陕北前进。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1月15日，中共中央在遵义举行了“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制定了红军新的战略方针，从而在最危险的关头挽救了红军和中国共产党。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是中国共产党对革命的成功探索。同年3月，组成了实际上以毛泽东为首，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他们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名义指挥红军的行动。

（二）反省革命曲折的教训

革命的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我党在第二次国民革命战争时期曾经犯过三次“左倾”错误，其中以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给我党造成的损失最严重。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统治长达4年之久，在理论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备，影响最深，危害最大。左倾本意是指政治上追求进步、同情劳动人民的倾向。但是带有引号的“左”倾，就不是追求政治上的进步，而是政治思想上超越客观实际，脱离社会现实条件，陷入空想和冒险的倾向，即极“左”。所以，为了表示贬义，特在左字上添加了引号，即“左”倾，用来区别于带有进步意义的左倾。通常“左”倾思想表现为三种，第一种是急于求成，主观地夸大革命力量，轻视敌人力量，忽视客观困难，在革命和建设采取盲动的冒险的行动；第二种是在革命组织内部混淆两

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政策；第三种是在同盟军问题上实行关门主义，打倒一切。

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国际共产主义对党的领导机关进行改组，陈独秀被停职，张国焘临时主持中央工作。1927年8月7日，共产国际派罗明那兹到汉口出席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指定瞿秋白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主持中央工作，成为继陈独秀之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共中央在瞿秋白的领导下，11月在上海召开了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接受了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提出的“不断革命”的错误观点，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叛变革命后，已经成了绝对的反革命势力，中国革命要推翻豪绅地主阶级，就必须同时推翻资产阶级。因此，罗明那兹得出了中国革命的前程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急转直下进入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结论。他们还提出了没收民族资产阶级企业的错误政策，否认大革命失败后处于低潮的形势，固执地认为敌人的屠杀进攻恰恰证明了革命潮流的高涨，提出党的总策略是发动城市工人和农民举行总暴动。在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路线下，中央政治局先后发动了南昌暴动，广州暴动以及秋收起义。他们不顾敌人的强大和革命失败后的实际情况，反对组织撤退，命令共产党员和群众去发动没有胜利希望的城市暴动。瞿秋白的这种“左”倾盲动主义、冒险主义给党和革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1928年党的六大以后，由于贯彻了大会的正确路线，使革命走向复兴的局面。随着局势的好转，共产党内“左”的急性病又逐渐发展起来。1930年6月，李立三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的《新

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错误决议。决议认为中国革命也好，世界革命也好，都到了大决战的前夜。所以，中国的革命不再需要逐步积聚的力量，只要大干只要武装暴动，全国便跟着一起武装暴动了。所以，李立三反对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思想，提出了组织全国中心大城市武装起义的口号，并命令红军进攻武汉、长沙等中心城市。这次会议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取得统治地位。日后的实践证明，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思想对形势作了根本错误的估计，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使党受到很大损失。1930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会议纠正了李立三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左”倾的错误估计，停止了组织城市暴动和红军进攻大城市的冒险计划。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的时间虽然只有3个多月，但使刚刚发展起来的革命力量遭受了重大损失：国民党统治区内，许多地方的党组织因为急于组织暴动而把原来的有限力量暴露出来，先后有11个省委机关遭受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红军在进攻大城市时也遭到很大损失，先后丢失了洪湖及右江等革命根据地。那么，中国革命为什么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呢？

第一，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由中国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中国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外部没有实现民族独立，并长期受到帝国主义压迫；内部没有民主制度，长期受到封建制度压迫。因此，在全局上和长时期内不具备合法斗争的条件，不可能像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那样，利用民议会制度和组织工人进行罢工实现革命。因此，中国人民要想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必然会

遭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镇压，所以现实的情况逼迫着中国人民只能拿起武器，只能以武装的革命来反抗武装的反革命，只能用暴力流血的革命的去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显著特点。

第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而栖居于城市里的工人阶级人数很少。显然，当时的中国革命不可能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有一个本身强大的无产阶级作为革命的主力，从而依靠无产阶级本身的力量就足以在中心城市举行武装起义并取得胜利，再联合农民的革命力量，把革命推向全国。在当时的中国，如果单纯依靠无产阶级自身的力量是无法占领中心城市的，即便一度占领了也无法长期巩固，最终会被敌人反扑抢占回来。

第三，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革命，武装斗争实质上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战争。农民是工人阶级可靠的同盟军和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废除封建土地剥削制度，是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也是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因此，中国共产党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就必须深入农村，发动武装农民，建立农村革命政权，开展土地革命，确立起革命力量的深厚社会基础，最后夺取全国胜利。

第四，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并且长期占据着中心城市。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敌我力量的对比和分布发生了巨大变化，敌强我弱形势更加明显。国民党新军阀在全国建立了反动政权，控制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枢纽和命脉，控制着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并且建立了一支十分强大的反动军队。所以，弱小的革命力量要在城市同占有绝对优势的敌人进行武装决战是非常困

难的。相反，在广大农村，特别是远离城市的偏僻山区则是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环节，这就为革命力量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可能。因此，中国革命只有在农村积蓄力量发展壮大，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才能最终夺取全国的胜利，这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1931年9月18日，日本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发兵东北，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已在中共中央取得统治地位。王明根本看不清“九一八事变”以后的中国的局势，把日本侵占我国东北看作是反苏战争的一个导火线，错误地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王明还看不到中国社会日益高涨的抗日要求，看不到中间派的积极变化和国民党内部的分化，错误地把中间派视为敌人，主张消灭他们。王明等人一味强调所谓的进攻路线，在他起草的一个文件中宣称“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把反对这种斗争的主张一概视为保守、退却甚至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王明利用组织手段把他们那一套强行推行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去。这样，就使革命根据地内的状况大大复杂化了，也使毛泽东的处境越来越艰难了。1931年11月初，中央代表团在瑞金主持召开了赣南会议，会上毛泽东坚持认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从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路线和方针是正确的，是符合根据地实际情况的。但会议在“国际路线”的旗号下，对毛泽东以及中央苏区从各方面加以批评：在思想上，把毛泽东坚持的从实际出发、反对本本主义指责为“狭隘经验论”，还说“红军中狭义的经验论，在实际工作中产生了不小